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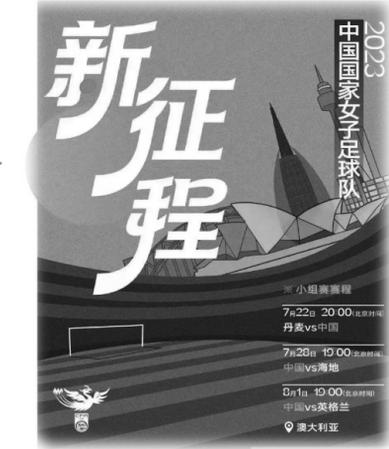
女足出征：要争取胜利 更要展现体育之美

阅读提示

近日，中国女足第八次出征世界杯。随着中国女排和中国女篮捷报频传的叠加效应，全社会对中国女足世界杯成绩的期待值也不断提升。女足主教练水庆霞表示，此次比赛的目标不仅是从小组中出线、争取胜利，更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女足运动员的健康和美丽。女足世界杯不仅是一项竞技运动赛事，更是一次跨越国界、交流互鉴的文化盛宴。遇强则强，敢做自己！为梦而战，未来可期！我们期待“铿锵玫瑰”再度精彩绽放！



训练、备战 2023 年女足世界杯。
新华社记者 丁旭摄



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出征名单					
主教练 水庆霞					
朱钰	徐欢	潘红艳	吴海燕	姚伟	
汪琳琳	高晨	陈巧珠	李梦雯	要加星	
张睿	姚凌薇	古雅沙	张馨	杨莉娜	
吴澄舒	张琳艳	沈梦雨	王珊珊	王霜	
唐佳丽	肖裕仪	娄佳惠			

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右)在训练中指导球员。

课程。经过不懈努力，她从香港“超级足球联赛东方队”的助理教练逐步成为主教练，并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书，成为全球第一位获得男子足球顶级联赛冠军称号的女性足球教练，获得亚洲杯年度最佳女子教练等荣誉，其优秀的工作能力得到广泛认可。中国女足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通力协作、共同打造了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参加本次女足世界杯的32支球队和她们身后的亿万女性，也将共同触发全球范围内广泛的情感共鸣与意识共鸣。

女足象征文化自信

中国女足队员身上闪耀着“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华彩，在引领社会风尚、彰显民族自信中同样发挥着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中国女性从参与体育的自觉到文化自信，展示出新时代中国女性在世界杯生积极变化的实力和成绩。2023年女足世界杯开赛前一个月，门票就已经售出了超过103万张，无疑有潜力发展成为具备稳定价值的品牌赛事，与男足共同将运动拼搏精神和体育之美带给全世界。

练备战、攻防转换和战术运用的详细数据能够轻而易举地检索，通过电子游戏的模拟来高度还原世界杯赛事。基于此，球员的影响力能够快速触达球迷及其日常生活。正如2022年2月6日，女足亚洲杯决赛时，中国队以3比2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当夜收视率达到了2019年以来足球类比赛的最高收视纪录，超过8500万电视观众收看了决赛，50个微博热搜中，有30个与女足相关。中央电视台的知名栏目《足球之夜》为中国女足做过一期节目——“每个人都是答案”，在坚韧拼搏的女足队员身上，能够找到我们每一个人不断追寻的有关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中国女足一直在“超越性别”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赛场上的逆转就是最好的女性力量教育！中国女性足球运动员，不仅是国际足联官网所列出的值得关注的5名中国女性足球运动员——王珊珊、唐佳丽、王霜、张琳艳和沈梦雨，作为体育精神的践行者，她们将激发女生参与足球、爱上运动的热情。

女足凸显团队意识

女足既包括上场踢球的女性队员，也包括球场下的指导教练，她们都是女足事业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如中国女足教练陈婉婷，绰号“牛丸”，现任江苏女足主帅，执教中国U16女足。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的她为了提升足球技能，主动修习了“足球教练A级班”和“运动医学”的硕士

课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由于社会、生理和文化等因素，成为遭受压迫最为深重的群体之一，因此，妇女的解放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不少集中国绕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要论述和深刻思想，对婚姻制度的本质与妇女压迫的社会根源、制度根源的揭示，对争取妇女权益的斗争方式、实现妇女解放的具体条件和深远意义的思考。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在传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础上，应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中国妇女的权益，推动和促进妇女事业发展，为全球男女平等事业谱写更动听的中国篇章、产生更大的世界影响。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数字素养、性别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卜卫 蔡珂

数字环境正在重新形塑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但研究表明，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基于这种思考，本文将讨论数字素养、性别与可持续发展的复杂关系。首先，分析数字素养概念的建构性，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社会发展的情境中去理解数字素养。其次，梳理“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发展”“妇女与发展”等重要概念的理论脉络。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从“性别与发展”理论视角揭示性别数字鸿沟，尝试提出通过包容性数字素养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和发展的政策方案。这个方案并不局限于技能或技术方面的培训，而是要挑战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消除一切阻碍妇女获得权利的障碍。数字素养提升不仅是为了改善妇女生计，还是为了通过信息技术在生产、再生产和社区(社会)发展等领域中赋权妇女，以促进性别平等和社会公正。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

《乡村振兴背景下女性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逻辑和路径选择》

作者：蒋楚麟 黄晓

近年来，农村留守妇女群体涌入乡村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公共空间，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群体。本文以贵州省黔南、黔东南、黔西南和安顺等地州市的农村女性专业合作社为调研对象，总结了农村女性专业合作社的特点，分析了其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路径，认为乡村振兴必须正确认识 and 高度重视农村妇女的价值，加强对农村女性合作社的组织化建设。通过案例调研，作者认为推动农村女性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不仅需要从微观层面上激发农村女性合作社发展的内生动力，更要强调来自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强大外部驱动力量。

来源：《社会治理》

《数字化转型、信息搜寻与女性高质量就业》

作者：仇化 尹志超

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数字时代的广泛应用需要建立在算法技术基础之上。算法开发所具有的趋向简化特征忽视了女性存在的多元向度，其预设的人性偏见、技术偏见与算法权力扩张使其难以避免性别歧视。本文作者认为算法性别歧视的实质是现实世界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在虚拟世界中的延伸。算法性别歧视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固化和扩大性别歧视，扩大性别数字鸿沟等。确立性别平等的算法伦理、增加算法的性别敏感指数、增加数据与算法的性别包容度、行业自律与相关法律法规联动并进行系统治理是消除算法性别歧视的关键。

来源：《财贸经济》

(实习生 李泓贝 整理)

学人关注

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新趋势与新特点

2023年7月8日，中国社会学会2023年会“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新趋势与新特点分论坛”在南开大学召开。论坛聚焦中国社会新时期婚姻家庭变迁出现的新现象、新趋势与新特点，与会学者以主题发言、论文交流、与谈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新发展阶段的婚姻与家庭关系”“家庭代际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化”“低生育率与家庭友好政策”“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婚姻家庭”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

编者按

■ 晏浩 苗茜 陈玲 刘梦欣

近日，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学会2023年会“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新趋势与新特点”分论坛在南开大学召开。论坛聚焦中国社会新时期婚姻家庭变迁出现的新现象、新趋势与新特点，与会学者以主题发言、论文交流、与谈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新发展阶段的婚姻与家庭关系”“家庭代际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化”“低生育率与家庭友好政策”“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婚姻家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新发展阶段的婚姻与家庭关系

新发展阶段下，新媒体平台与婚姻状态相互交织。厦门大学副教授刘子曦通过对公益相亲平台的田野调查，指出用户的“社会身份定位”与“婚恋匹配观念”是影响其隐私边界的重要因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生马凯榕基于对276座城市的调查，发现新媒体使用加剧了年轻一代的婚恋焦虑。婚恋观念在性别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异质性。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运用扎根理论，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的婚恋观更体现去体制化趋势。“家庭代际结构和风险感知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婚配不兼容。成都文理学院辅导员刘俊飞对成都和太原高学历青年的择偶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座城市的青年择偶倾向不存在明显差异。婚姻形态和家庭行为呈现多元化态势。南京大学副教授许琪发现，从实质上看，家庭行为背后的逻辑或动机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中国农业大学

博士生黄明雪关注到浙江唐村两头婚现象，指出“两头婚”塑造更加平等的夫妻格局的同时，在隔代抚育与财产继承上可能使祖孙关系出现危机。

大学生婚姻意愿和两性初婚年龄有所下降，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北京大学博士生沈小杰根据“中国大学生婚恋观调查”数据，发现中国二代大学生比一代大学生有更低低的婚姻意愿，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横向分化对于大学生婚姻态度带来异质性影响。

不同的育儿模式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基于祖辈权威资源视角，上海大学副教授陈佳发现代际共育中祖辈对父辈的心理控制对代际共育关系中的积极和消极维度均产生显著影响。安徽建筑大学硕士生马婕非运用生存分析法探究劳动参与对个体婚育轨迹的影响，发现劳动参与对初婚和初育有显著推迟效应，且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家庭代际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化

人际交往观念在不同代际之间有所不同。宁夏大学副教授曹格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人表现出更多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特点，而20世纪80年代人则表现出更多的西方个人主义特点。中山大学硕士生万梁幸子基于对12位月子会所中年轻产妇产的访谈，探究个体化进程中两代女性何以借助月子会所提供的服务与空间实现主体性实践。

亲属网络与人际网络息息相关。南京大学教授沈毅通过案例对比，厘清了亲属网络人情交往中“自利疏离”与“过度嵌入”两种亲属网络类型，指出网络形成的义利紧张性使得现实中难以达成人际网络中的平衡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

生项江南实地调研分析了双方父辈家庭为达到家族权力均衡作出的协商，并进一步分析了“两头婚”中夫妻双方各自的父代家庭追求公平对婚姻关系和个人自主性的影响。

就子代对父辈的影响而言，河南师范大学讲师翁堂梅基于代际共生视角，发现随子代进城的老年女性面临新环境的适应性问题，独自留守在农村的老年男性也出现情感上的孤独。清华大学博士生卓唯佳的研究发现，在照护支持中，子女的“家长权力”被机构的正式管理规范所加强并制度化；在社会支持中，子女帮助父母管理社会关系和实现再社会化，使其“家长权力”渗入老人机构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父辈对子代的影响而言，北京科技大学讲师郭文的研究发现，部分教养者会采取社交回避、教养表演、双面育儿等多种办法洗脱污名，以呈现“好家长”的自我形象。复旦大学硕士生吴晓璐的研究发现，在对父职的重构下，军人群体倾向于在军职与父职的张力中寻找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候鸟式育儿、电话、“不在场”的陪伴等成为代偿方式。

低生育率与家庭友好政策

生育意愿和生育偏好受到代际关系、婚育顺序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南开大学博士生田文泽基于CFPS2018数据，发现“啃老”显著抑制了个体的生育意愿，而“孝老”则产生了显著积极影响。广州大学副教授方英通过对21位潮汕地区受访者的访谈，发现生育性别偏好呈现多元趋势，个体的经济、文化、家庭和情感需求构成了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因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顾松基于CFPS数据发现，丈夫在观念和行动上与妻子支持性别平等，能显著提升妻子的生育意愿。

生育观念受到现代化过程中现实因素的影响。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生吴雨倩与四川大学硕士生贺文伊基于CFPS2018数据，指出以传统代际认可度为代表的生育观念的现代化改造，主要包括单位性质引导和个人地位引导两种机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生葛晨露从共同体本体论理论出发，指出个体最终的生育选择是其与共同体在独立与依存的互动关系中达成的一种具有历史性和情境性的平衡。

生育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发挥一定作

用。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张洋以27国总和生育率反弹过程为例，发现倾向于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西南财经大学讲师卢冲利用两个调查实验，发现生育支持政策提升了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平衡型生育支持模式相比于传统型生育支持模式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于萌以目标多样化、手段多重化和利益主体多样化三个角度的政策悖论为分析框架，指出韩国的家庭支持政策存在悖论现象。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婚姻家庭

个体和家庭受到家庭支持政策、法律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形塑和影响。上海大学副研究员莫真通过对法国家庭政策体系构建发展史的系统回顾，探讨了个体化社会得以持存的可能性。兰州理工大学教授原新利发现家庭教育促进法可以通过保障、引导、支持家庭教育的方式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山东大学教授王向贤认为，父亲积极育儿，既是家庭均衡从工业化早期模式转向新型模式的必要，也是性别革命从女性走出家庭的上半场发展至男性走入家庭下半场的需要。

个体的选择也会反过来影响政策甚至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郭云蔚发现，以家庭为主要责任主体的德国开始增强家庭外保育服务的供给。上海大学教授汪迎春聚焦上海市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发现家长的婚育观念和性观念呈现出传统和现代杂糅的状态，具有鲜明的性别模式和显著的性别界限。吉林大学博士生寇凯亮的研究发现，传统家庭主义强调核心家庭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与发展主义强调金钱财富积累的价值观念的相互整合成了一种新家庭主义文化。

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婚姻形态并不稳定，夫妻间开始出现新的居住模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周合对历次人口普查与民政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结婚人数不断减少，离婚与再婚人数呈上升趋势，初婚年龄不断提升、生育年龄不断延后。广西大学副教授吴凡的研究发现，异地分居夫妻双方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均较高，且家庭关系和经济状况是影响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